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动荡与重塑:2025全球高等教育年度坐标

■郭英剑

2025年,世界高等教育迎来一个极具张力的节点:政治力量、技术革新、人口变迁与全球治理同时发力,使这一年的高等教育既不同于以往,又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美国制度性矛盾的激化、全球学历互认框架的推进、就业市场对传统学位价值的质疑、亚洲与新兴经济体的上升趋势、人工智能(AI)对教学与评价机制的冲击等多重线索交织,构成了这一年高教领域的主旋律。

2025年不是简单的一年,而是一个转型节点:它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机构,更是社会结构、文化认同与全球公共价值的承载体。在动荡与不确定性中,高等教育对自身定位的检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制度震荡中的美国高等教育:
政治重构正在发生

2025年,美国高等教育再次被推到了政治与制度的中心,但这一次的冲击不同于过去几年围绕校园文化、言论自由或 DEI(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的局部争论,而是对整个制度框架的挑战。

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治阵营明确提出一项政策主张:废除美国教育部。这一提案一经提出即引发巨大关注。美国教育部自1979年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联邦教育政策的协调、学生贷款及资助体系管理等核心功能。废除教育部不只是机构撤销,还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对全国教育政策的直接统筹,将教育事务大幅下放到州与地方,甚至有评论认为这是放弃“国家教育权力”的象征。尽管这一计划尚未实现立法,但它反映出一种根本的政治逻辑,即把高等教育视作私人选择而非国家责任的一部分。

与此相伴的,是美国白宫倡议的所谓“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该契约试图将高校获取联邦科研经费、学生资助等资源与其在“政府优先事项”上的政策承诺挂钩,包括对课程内容、校园治理等方面的规定。这种做法无疑加剧了高等教育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使得高校自治面临空前压力。

此外,联邦预算困境、学生贷款政策的反复,以及政府停摆风险,使美国高校的财政与运营压力持续上升,尤其其公共大学系统更是承受巨大压力。相比过去几年的文化议题,2025年的制度性危机更深刻地触及了大学作为公共机构的生命线。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校园内部关于言论自由、抗议与行政权力的争论并未消退,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学不再只是讨论“谁可以说什么”,还要回答“谁决定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政治化程度显著加深。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性重构的核心逻辑。

学位价值的全球性再质询:
时代的价值考题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大学学位价值的争论在2025年显著升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内部开始质疑传统四年制学位作为社会流

回望2025年,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结构性转型期。从制度性挑战到价值观重新审视、从全球合作制度化到技术驱动下的深层变革,高等教育的每一条主线都蕴含深刻的社会意味。



动、职业保障和知识学习的核心形式是否仍具有绝对的优势。

这一讨论有多重背景因素。

首先,在多个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大学毕业生面临与过去不同的就业现实。大型科技公司及新兴产业对技能的需求迅速变化,而许多传统岗位由于自动化和AI技术的推广而减少或重构。这使得“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对接”成为公众与政策讨论的焦点。

其次,这种质疑不仅存在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高等教育入学规模持续扩大,但关于“学位是否能真正带来职业回报”的讨论仍然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册学生已经达到2.64亿的历史新高,这一增长再次凸显了学历与未来竞争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后,面向终身学习与技能导向的教育模式成为现实压力下的“替代方案”。微证书、能力本位学习路径,以及短周期培训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关注。例如,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提出打造区域性微证书框架,强调微证书在弥补传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差距上的战略重要性。

这场围绕学位价值的讨论具有全球性意义。它不仅是对教育结果的评估,更是对教育为何而存在、如何服务社会与经济的根本性反思。

全球高教合作迈向制度化:
学历互认公约的现实推进

在全球治理层面,2025年见证了全球高等教育学历资历承认机制的制度化推进。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跨境流动受到学历承认和资历对接机制的制约。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了《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全球公约》的出台。这是首部具有全球适用性的高等教育公约,旨在确立公平、透明、无歧视的资历承认原则,促进全球学术与职业流动。

合程度。这表明印度在改革高教治理、引进全球资源、提升质量和国际化方面已做出具体部署。

不仅如此,非洲、东南亚与拉丁美洲部分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引进师资与建立国际合作项目,也在逐渐缩小与传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推动成立的南南合作大学区域中心正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亚太和拉丁美洲设立合作枢纽,通过资源共享、能力建设等举措加强区域高校的协同发展。

这都体现出一种新的世界高教力量构造:它并非简单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而是在全球多极化与地区性创新驱动下呈现出多中心、多样性的发展逻辑。

AI时代的教学、评价与伦理重构

随着DeepSeek在2025年1月横空出世,AI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AI不再只是教学工具,而成为挑战传统教育模式、课程设计与学术规范的深层力量。

在教学层面,越来越多的高校将AI用于辅助课堂互动、学习资源推送、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等多个环节;同时,也出现了围绕学术诚信的新问题。例如,如何在AI辅助写作与原创性之间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如何保护学生数据隐私,以及如何确保AI算法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等,都成为高校政策制定与学术治理的重要议题。一些研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AI高教伦理框架”,强调在确保创新的同时保证教育的价值与公平。

此外,AI对评估体系的冲击尤其显著。过去依赖传统考试与论文的模式,正在向更加注重能力展示、项目驱动与动态评价转变。这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就业市场对“可验证技能”的需求,但也引发了关于评价标准公平性与跨文化适用性的讨论。

因此,AI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教育目的、评估逻辑与伦理价值的重构力量。

危机是拐点,公共价值是方向

回望2025年,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结构性转型期。从制度性挑战到价值观重新审视、从全球合作制度化到技术驱动下的深层变革,高等教育的每一条主线都蕴含深刻的社会意味。

在我看来,这一年的动荡不只是挑战,更是一个迫使高等教育重新验证自身公共价值的时刻。大学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场所,更是社会公正、文化理解与全球对话的桥梁。在全球治理缺乏共识和机制碎片化的时代,谁能在不确定性中坚守教育公共价值,谁就有可能塑造未来高等教育的核心格局。

2025年不仅呈现一系列事件和趋势,更引发我们对教育何以为人、何以为公的深刻思考。高等教育的未来不会回到过去,而是会以更具韧性、开放性和人文关怀的方式继续前行。

高校应切实化解大学生的“创业恐惧”

■陆根书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创业问题引起国际上众多学者、有关组织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为缓解就业压力,鼓励、支持大学毕业生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并强调以创业带动就业,有关部门也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

然而,有证据表明,虽然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但大学生的整体创业意向并不高,实际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更低。笔者团队曾接受陕西省教育厅委托,开展“陕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跟踪调查”,发现近年来陕西高校大学毕业生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仅维持在2%左右,几乎没有增长。

调查显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创业活动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学生不仅会对创业失败产生恐惧,而且会对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等感到担忧。这种负面情绪会对其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态度产生消极影响,进而阻碍其创业意向与实际的创业行为。

高校应完善创业支持体系

从调查结果看,大学毕业生对创业失败恐惧程度较高,可能与创业活动本身的风险以及当前高校不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有关。

一方面,近年来新创企业生存压力加大,使不少大学生对创业持更为谨慎甚至消极的态度。在校期间,大学生可能缺乏创业实习和参与创业活动的机会,而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水平较低、缺乏资金的大学生而言,创业兴趣可能进一步被抑制。

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对高校创业支持的评价较低。这意味着高校在创业支持方面存在不足,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还不太匹配,无法充分发挥促进大学毕业生创业的预期作用。

面对大学生的创业失败恐惧,高校创业教育何为?笔者认为高校创业教育要充分发挥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识别功能,二是赋能功能。

首先,高校创业教育要充分发挥识别功能,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创业。高校不能无视创业失败的可能性,更不应将其浪漫化,创业失败是高校创业教育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大学生一旦创业失败,会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自我怀疑、焦虑或挫败感,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外界评价。此外,创业失败还可能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如承担资金损失,甚至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因此,高校创业教育要为大学生提供一系列资源。例如,高校可为学生提供心理测量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识别自身是否具有创业的潜能、是否具备创业者的个性特征和适宜的创业策略等。

其次,高校创业教育要充分发挥赋能功能,帮助大学生降低创业失败恐惧程度。鉴于创业失败恐惧对创业意向、创业活动的不利影响,高校创业教育必须充分发挥赋能功能,更加注重解决有志创业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性问题。

创业教育四大方向

在高校创业教育明确功能的前提下,还需要在内容与机制上作出系统性调整,重点

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要重新设计和优化创业教育。高校应在增强创业知识技能学习的同时,加强有关创业风险的教育,强化大学生的抗挫折能力。研究发现,创业失败恐惧对创业态度、自我效能和意向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自我效能、韧性、乐观精神等个人特质能显著降低创业失败恐惧程度。可见,这些个体特质在大学毕业生创业意向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创业教育应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相关特质。

二要提高对大学生的创业支持水平。研究发现,大学创业支持对创业失败恐惧与创业意向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高校在大学生面临创业失败恐惧时,如果能够在营造创业氛围、改进创业条件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创业失败恐惧对大学生创业的消极影响。

为此,高校创业教育有必要通过与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合作开展创业指导,开展模拟创业训练、提供创业实习等方式来加强创业教育。例如,研究发现,与成功企业家的接触能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灵感、培养其识别创业机会、增强获取创业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并让他们感受到创业的可能性。高校还要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和孵化器支持,以及出台资助政策等措施,营造支持创业的良好生态系统。此外,高校要为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提供“软着陆”保障。许多学生害怕创业失败后,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学业,还导致求职困难。高校要通过灵活的学籍管理与学分认定,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支持,消除有创业意向学生的后顾之忧。

三要积极消除对创业失败的污名化,鼓励大学生从创业失败中吸取教训。创业失败虽然会引发大学生对创业的恐惧,但不应把它视为创业旅程的终点,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学习机会和尝试新事物的契机。失败是创业过程的一个正常阶段,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经历过多次失败,关键是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将其转化为成长的动力。高校要强化与冒险精神和接受失败相关的创业教育与培训,以培养创业文化,鼓励大学生从创业失败中吸取教训。

四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个性化的教育策略。研究发现,有家庭创业背景的大学生比无背景的学生拥有更强的创业意向,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也拥有更强的创业意向,来自农村或城市、毕业于不同层次高校的大学生也存在创业意向差异。因此,高校创业教育要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总之,创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高校在支持大学生创业发展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然而,由于担心创业失败,大学生许多出色的创意可能永远无法实现。面对大学生的创业失败恐惧,高校不应只是简单地鼓励创业者,更应是创业教育的改革者、学生创业认知的重塑者。同时,高校还应成为创业支持生态的构建者和创业文化的营造者。高校创业教育要充分发挥识别与赋能两重功能,通过系统性的努力,将创业失败从一个令人恐惧的“终点”,转变为一个可被接纳、分析和学习的过程,从而真正释放大学生的创业潜能。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时值2025年年末,大学里传出的两则消息引起媒体和网友的热议。一则是一所“双一流”名校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年仅26岁的青年教师成为“博导”;另一则消息是某医学院校的本科生一年之内发表了约50篇论文,其中44篇论文被SCI期刊收录。

对大学从业者来说,这两则消息并不令人意外。近些年,大学以及校际之间的“内卷”程度之深,早已让人感同身受,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出现几位数量上的“标兵”也属必然。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对这些现象的“见怪不怪”。这种态度往往是不明白问题所在,其表现要么是一笑置之,要么就是本能地为之辩护。无论哪一种表现,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忽视质疑声中的合理因素。

两则消息传出后,媒体、网友与大学从业者的不同反应就是一个证明。媒体、网友基本上是在质疑,而大学从业者则以“当局者”的身份给前者下“指导棋”。这中间固然有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差问题,但质疑背后所依托的常识判断,对大学管理而言,却是一次提醒。

常识是一种基本理性,大学管理的基本理性就是不能违背教育原则。

如果依据大学现有的管理政策,这位取得“博导”资格的青年教师和这名大量发表论文的本科生并没有违规。相反,他们是本校激励机制的受益者,也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在如今的大学,只要拥有一定级别的纵向或一定数量的横向科研项目、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就可以带博士生。也就是说,教授自不待言,副教授、讲师或助理教授,同样可以成为“博导”。那位26岁的博士毕业生,就是通过所在学校的人才计划获得了一笔资助经费,从而获得了“博导”资格。

由于大学实行的是量化考核,只要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论文发表自然是多益善。论文既可以为个人带来荣誉和收益,也可以提升管理者的政治和学校的排名,属于一举多得。

然而,媒体与网友并不在乎大学的政策或机制,他们在乎的是结果的合理与否,即刚刚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有没有资格作为“博导”指导博士生。这里的“资格”并不是大学晋升的条条杠杠,而是一种含义丰富的普遍认知。

学生辅导学生,当然值得提倡,但那只能算是相互帮助。身份刚一变化就由“相互帮助”变为“指导”,而且是对于大学里学位层级最高的博士生进行指导,这在公众看来难免有悖常理。在他们看来,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不应该仅仅传授知识、方法和技能,还应承担“人的教育”的职责,所以公众才会对“资格”提出质疑。

实际上,公众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博士生还需不需要兼顾人格相关的教育。进一步看,科研项目作为确定“博导”资格的唯一或重要标准,本意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内外教育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与本土情境相协调的问题。

对于本科生大量发表论文,媒体与网友之所质疑,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学术名家一年之内发表数十篇论文尚存在“灌水”问题,一名只有一年论文发表经历的本科生发表如此多的论文,更是不可思议。

这里也涉及两个教育常识,一是质胜于量;二是学术研究的态度。学术论文永远是讲究“质”的,不存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例外。有此严格的“质”的要求,即便是有经验的名家,一年发表约50篇论文,也存在违背学术规范的嫌疑。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说,如果一开始就鼓励以量取胜,那就是指导教师的不负责任。追求数量者不仅可能打各种类型的“擦边球”,往往也会在利益面前成瘾。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名学生不改变研究习惯,他的科研之路不会走得太远。

就常识层面说,原创性的研究虽然必须跟踪专业的前沿,积累一定的“量”,经历从量变向质变的过程,但其基本前提却是“坐得住”。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说,就是“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如果学者经常出现在飞机上、会场中、酒桌上,不要说是一般人,就是“惊为天人”,也无法取得与资质相匹配的学术成果。

目前,上述“双一流”大学已经对媒体与网友的关切作出了回应。可惜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应没有意识到质疑的合理因素,也并没有消除公众的疑虑。而另一所大学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如果该校仍旧跳不出自我营造的藩篱,回应的内容是可以想见的。

可以说,当下既是大学与社会距离最近的时代,也是大学受到社会影响最明显的时代。面对社会质疑,希望大学能够发现其中的建设性因素,不断完善自身管理。尊重常识,特别是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基本常识,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

尊重『常识』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